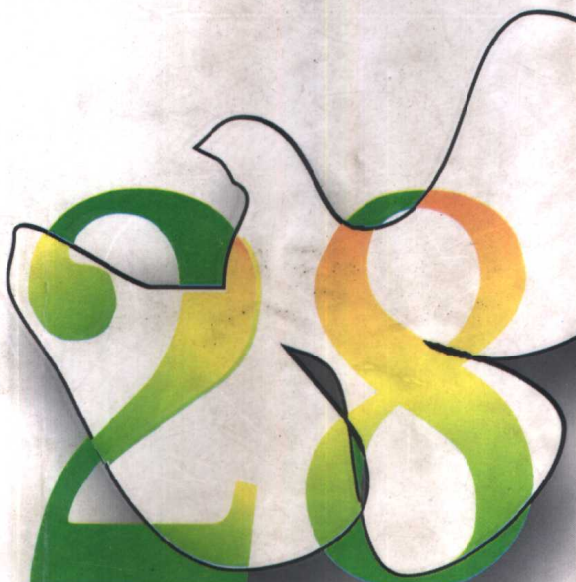




归去 来兮

吴迪 李经 主笔

二十八个归国留学生的命运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归 去 来 兮

——28个归国留学生的命运

主 笔 李 经 吴 迪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去来兮: 28 个归国留学生的命运/李经, 吴迪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35-1814-6

I. 归… II. ①李… ②吴…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71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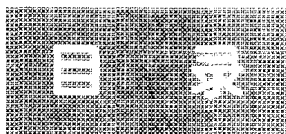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0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4.00 元



侧 记	[1]
这些日子以来	[4]
放弃美国	[19]
义无反顾	[31]
随遇而安	[43]
凤凰于飞	[49]
出世入世皆文章	[60]
永远不再离开家	[70]
非常建筑	[79]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86]
边际人的求索	[96]
人面蚂蚁	[106]
跟着感觉走	[115]
我叫伊万	[125]
我有一个梦	[133]
名流陶景洲	[144]
留学哈佛的中国官员	[154]
一溜小跑	[162]

最后一次选择	[168]
实话实说	[176]
希望生活才刚刚开始	[186]
澳洲教会我选择	[194]
天生我才	[203]
故土情缘	[214]
原则	[222]
中国梦	[234]
爱是不能忘记的	[244]
中国需要实干家	[254]
彷徨爱情路	[261]

侧记

留美回国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一是谈谈在美的经历，但更多的是想说说回国后的感受。然而，由于工作忙，加上又有点懒，一直没有动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萌发了写东西的冲动。

记得那是1996年圣诞节的晚上，几个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到家中作客。由于大家的经历相似，又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故每个人的谈兴都颇浓，竟然没有发觉时间过得飞快。当谈到是否应该对留学的经历写些什么时，一位朋友不经意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重点谈谈回国后的感受？也许这样对我们、对那些仍在海外的朋友们会更有意义。此君话音未落，大家一致击掌喊好，称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事实上，这几年有关留学生的文章已不少见，但绝大多数是写这些留学生如何在外艰苦奋斗、独闯天下的，其中既有悲壮的，也有结局美满的。远的不说，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就曾令多少国人和海外学子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出国热的降温，有关留学生海外“淘金”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开始降温。与此同时，受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开始把目光投向祖国，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留美、留欧、留

澳、留日……的“寻梦者”回到了他们那既熟悉但又有些陌生了的土地。

作为已过够了“洋瘾”的归国留学生，回国后的感受自然是百感交集。因此，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笔来记录下我们的种种感受，我们希望那些没有出国留洋的人能通过我们的笔得以窥视外面的世界。同时，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笔来描绘一下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看看留学热这个历史现象对个人及其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使本书更有代表性，更接近普通人，我们刻意没有去采访那些出了名的归国留学生。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我们只想通过写普通人，来反映普通生活，从而揭示一个特殊时期的普遍现象。对于这一点，本书的书名也许能有一定的说服力。记得当时讨论书名的时候，大家先后提出了十几个方案，其中不乏有些听起来很响亮，甚至很伟岸的。但是，能简单明了地反映本书内容的恐怕非现在的书名莫属。这个书名就好像书中的那些人，很普通，不张扬，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没有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大的不同。

在制定本书的写作计划时，我们曾想在半年内完成。殊不知每人繁忙的本职工作，加上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将剩余的时间挤得少而又少，以致交稿的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了两次。另外，由于时间紧，对一些人物的采访和写作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对此，本书的作者恳切希望广大读者能给予理解和谅解。

另外，回到中国的人已着实不少，但现居海外的为数更多，就像一座浮于水面的冰山，毕竟有八分之七的体积人们无法看到。那么，这“八分之七”的所思所想是什么，特别地，当他们偶然回国时，又有些什么感触？我们特意从一本叫《北美行》的杂志中选了几篇文章放入本书，权当茶余饭后的一小块

“甜点”。值得说明的是，《北美行》是大陆留美学生于1987年在美国南部自发创刊的一本杂志，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风风雨雨。

写书和出书是一件苦事，但同时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对我们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希望它能给读者朋友们一些启示，能给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出国“留学潮”做一点小小的诠释，更能为成澎湃之势的“回国潮”提供某种形式的注脚。面对这不可抗拒的历史的脚步，我们以一种日益增长的希冀与焦灼完成着这个跨越’97的写作计划，虽然能力有限，书中也尚存不如意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作 者

1997年10月6日 北京

这些日子以来

10 年来，她是当地第三个无绿卡回国者，也是唯一的女性……和丈夫两地分居，饱尝理想和现实的痛苦。朋友成陌生，母亲的压力，同事的议论……但她不想向任何人求援，只为了证明她的决定是对的。

钟晴：女，28 岁，1992 年某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同年结婚赴美，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96 年只身回国。无绿卡。现在上海一国际广告公司就职。

一意孤行

我会选择一些容易记住的日子，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回头看时，所谓命运，正是由那几个日子决定的。

去美国的那天，是我 24 岁生日。回到上海是 1996 年 7 月 1 日。

据休士顿中国领事馆统计，10 年来，我是当地第三个无绿卡的回国者。前两位都是男性，一位因回国跟太太离了婚，另一位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太太劝上飞机。不愿回的都是女人，

到了我们家，反过来了，没呆够的是我先生。

（林黛玉道：“人都说大观园万紫千红，我眼里却只是一座愁城。”）

休士顿的死寂让我窒息。

回国的计划是秘密进行的。我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我认识、认识我的人委实太多。领馆说要给我开个欢送会，发个“学成回国”之类的牌子，我谢绝了，推说只是回去看看。我参加过那种欢送会（前两位回国者都获此殊荣），让人起鸡皮疙瘩。

回国前一个月，我把电话拨到“留言”档进行过滤，不相干者一律不接。终于有一关躲不过。那是几个我喜爱、尊敬的真正的朋友，设饭局为我饯行。先生找了个借口没出席，我单刀赴会。

菜吃完了，礼物送了，祝福的话也说了，大家还没撤的意思。有一位低着头，拨弄着筷子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我好像说了一箩筐，后来演变成一场关于婚姻爱情的讨论。我和先生受个人主义浸淫久矣，自以为不俗，我们藐视白头偕老，藐视一方为另一方做牺牲，藐视儿女双全，藐视一切家庭化的家庭……

所以，当我们意见不一时，我只有独行。

吾土吾民

走出虹桥机场，我深深吸了口气。抬头看到月亮。

有位回国探亲的朋友说：“一走出虹桥机场就不能呼吸。”她肯定是感冒了，鼻子不通。

家里重新装修过，有一面墙上挂着幅巨大的新版上海地图，这幅地图帮了我大忙，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外乡人。

1991年我还在念大学时，接待过几位第一次来上海的室友。精疲力尽地陪她们逛完了南京路、淮海路，她们给上海的评语是“真破”。我空前地沮丧。现在，上海是一座新城，她整洁、漂亮、多彩，没有我所担心的因新导致的浅陋粗俗。淮海路像是纽约的某些路段，上海的地铁几乎是香港的翻版。不过，上海比纽约多了份秩序，又比香港少了份乡土气。上海就是上海。

一回上海，满耳都是“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标准还有距离，但确实是什么都有了。

在美国时，有位朋友探亲回来曾经设想经营邮政广告。他兴奋地侃了一晚上，就没了下文。现在，《新民晚报》每天都夹着厚厚一叠彩印广告。大家都喝起了纯水，有人送水上门。买机票也可以送上门。我母亲烧菜少了瓶辣油，打个电话就有人送来了。

我买了一台传真机，发现并不像传言中所说需要去公安局登记。许多人家买了电脑，父亲也在学用 E-mail（电子邮件）。VCD 和大屏幕电视流行不久，DVD 后来居上。除了我之外，好像人人都有 BP 机、手机。出境旅游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邻居计划着新马泰两周游。超市遍及全市，有个叫 BASICS 的连锁便利商店 24 小时营业；上海终于有了现代化的博物馆……

回国的第一个月，我的欣喜一个接着一个。

从母亲那儿知道了南京东路“步行街”。周六下午，这条上海最拥挤的马路禁止车辆通行。

我去了。

那么多人！那么多五彩斑斓的人！摩肩接踵像是在参加一个 parade（游行），炫耀的是他们自己。上海人，外地人，外

国人，红男绿女，扶老携幼，提着各种购物袋，脸上透着自信的笑容，从容地走着。

前面响起喝彩声，行人纷纷让出一条路。一群踩着旱冰鞋的孩子，一个搭着一个飞驰过来。他们欢笑着，叫嚷着，像一串翻飞的花蝴蝶。一个孩子倒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又排成一溜飞舞起来。那厢又来一支旱冰队，喝彩声又起……

一种感动攫住了我。我痴痴地看着，热泪盈眶。

自由有很多种说法，对于眼前的人们来说，自由就在他们脚下。

吾土吾民。

7月7日，收到先生的传真——

晴：

现在在银行里给你写信，借口出来为公司存税款。Houston 实在不想再呆了，除非有很好的工作。

希望你在上海过得愉快，如果不开心随时可以回来。很多朋友都在问你好——看来你的人缘比我好多了，有些人我都不认识。

老习惯新规矩

回国探亲的人对国内的批评可谓面面俱到，国人对我等“假洋鬼子”的奚落也毫不留情，比较著名的是“三气”：“说话洋里洋气，穿衣土里土气，花钱小里小气。”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识时务，所以回国前就决定采取

低姿态，入乡随俗。

我能管住自己不说“Hello”，可是“谢谢”两字怎么都忍不住。有一次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袋牛奶，朝摊主欠了欠身（因为他坐在板凳上）说“谢谢”，老头慌忙站了起来说，“哪里话，你照顾我生意，我应该谢谢你”。

不讲究穿，是美国令我喜爱的一点。穿衣打扮上我智商很低，而上海女孩在穿着上“与国际接轨”是超前的。

不得不痛改前非。一位休斯顿的朋友来上海公干，见到我没认出来——“你在美国时像个书呆子，怎么一到上海就变成个小姐了！”

我拉着她左躲右闪地过马路，很自豪地告诉她，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恢复了过马路的本事。

在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位女留学生回沪探亲，看到出租车司机向外吐痰震惊不已。她说：“什么时候大陆司机不再随便吐痰了，我再回来。”这位女士如果不是矫情，就是有点死脑筋。

我的应对比她积极。某次坐出租，听司机咳嗽一声，摇下车窗欲行方便，说时迟，那时快，我递上一张手巾纸。他笑了：“你是从外面回来的吧？”

可是上海并不是所有的街道都有垃圾桶。慢慢地，我也就犯规了。我等待着传言中的 Reverse culture shock（反向的文化震荡），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好像我从来没有出过国。

7月15日，收到先生的传真——

今天老板不在，干私活儿，就是给你写信。

上班下班，回家时房里跟出门时一样，没有任何人的痕迹，Cable（有线电视）停了，因为我不肯付账。录像也渐渐淡了，因为没有好看的录像可看。

我有时也打回国的主意，但好像总觉得在美国还没有呆腻，

何况我已经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了。

很多人都佩服你敢做出如此的选择。我只能再三解释实在是我太没有魅力，吸引不住你。

朋友哪里去了？

有人回国，大宴小宴不断。我却没那个福份，我只被请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新锦江顶层的旋转餐厅。那天下着雨，延安西路高架桥的灯火像钻石般闪烁。

每位 490 元人民币的自助餐，有一切能在美国酒店吃到的东西。有乐师弹琴。

我对林子平说：“没想到，还是你请我吃饭，惭愧。”林子平是一家大报的记者，小有名气。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给他写了一篇人物专访，他很满意，就算是朋友了。

出国前，他在红房子西餐馆为我饯行。当时的我壮志凌云，说：“等以后回来一定要请你吃饭。”

4 年后，他炒股赚了几百万，而我只带回来一个学位和满肚子不合时宜。买单的依然是他。

35 岁的林子平已经开始发福了。他是个有教养的文化人，不至于有暴发户的嘴脸，可是成功者的自信和得意是掩藏不住的。

“这个周末要去厦门过，住希尔顿。对，就在海边上。泡泡海水浴。在沙滩上看看书，星期天晚上回来。”

我看了看身上那条 GAP 的裙子，当初看到 100 美金的标价时，犹豫再三才狠心买了下来。现在，那种良好的感觉荡然无存。

他为什么偏偏要设在沙滩上看书呢？如果他说要花3万块吃一只龙虾，我还会在心里嘲笑他一下。可恨啊，可恼！

那顿饭后，我再没找过林子平，他也没找过我。

第二顿饭是两个人一起请的——王前和刘小芸，同在另一家大报工作。

饭局设在一个小馆子里。我迟到了5分钟，因为等公共汽车。他们得知后都笑了：“你还坐公共汽车？够省的。”

他们都是打车来的，可以报销。

王前是跑金融的，他建议我去炒股票。“你有护照，可以去买B股。B股马上要启动了。”我说现在没这个心思。

王前还想出国，他说这事已经说了10年了。我给他泼了点冷水，他显然有点不高兴。

董桥说墨痕断处是江流，没想到一顿饭后也成了江流。有时连一顿饭也不需要，通过一个电话，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欲望。上海人都在忙赚钱或者忙着谈赚钱，除了这两个话题，就没有谈话的必要了。回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周围有趣的人太少。原以为回国就会改善，看来是异想天开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每隔一个月打电话来Check（查询）一次，问我有没有后悔。他曾在菲律宾遭抢劫，什么都没了。那以后，他觉得什么都可以丢，最珍贵的是人与人的情感。

7月29日，收到先生的传真——

晴：

你在上海的事要不要告诉我父母？如果需要，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他们至今尚不知道。如果你觉得不需要，Forget this（忘掉它）。

忙时无聊，不忙时也无聊，你说怎么办？

跟王振宇律师的助理谈了谈，恐怕办绿卡至少要一年多，而且手续很繁琐。仍在犹豫是否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做下去。不知

去香港会怎么样。当然最好是美国公司派我去香港，这样可以
通过 E-1，一年后就可拿到绿卡。What's your opinion (你意如
何)?

重续新闻梦

美国的电视好看。每当我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就想
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样好看的电视。回国一瞧，居然就有了，尽
管不多，《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几乎让我惊
讶了。

虽然在美国迫不得已改学商科，新闻仍是我的最爱。

去电视台，好好干一场，我兴奋地这样想。

8月9日，我开始在上海浦江电视台打工了。

这是新建的电视台，100多号人，却开出了三个频道，人手
严重不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编制的；第二类是
合同工；第三类是像我这样纯粹地打工，不签约，来去自由，拿
稿费，每月最多800元人民币，其它无任何福利，连工会分茶
叶也没份。

“你要考虑清楚，我们现行的制度就是这样。”党委书记又
重复了一遍。

“没问题”。我真的没太在乎钱的事。

我被分配到一个叫“生活”的栏目，每天15分钟的节目，
却只有一个编辑，我叫他“刘老师”。

进浦江台的第一个月，我忙极了，索性晚饭都在食堂吃。很
快我就能独立制作。15分钟的专题像个小电视剧，把自己的想
法变为画面广为传播比做文字有成就感。

1996年上海几十万工人下岗，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下岗工人大都是女性，我的一位表姐也在其中。我连续做了好几栏下岗女工自救的专题。那个夏季，我整天泡在弄堂棚户，走街穿巷，将她们的早点车、盒饭店、净菜社、管乐队一一摄入镜头。

有一位被采访者的儿子，上初二，他懂事地对下岗的母亲说：“妈妈，我只要每天吃大饼就可以了。”我的鼻子酸了，我很想为他们多做一些事。在美国处处可见的homeless（无家可归者），不曾影响我的情绪，在我眼里，他们和平整的草地、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一样，只是一种景物。

8月20日，收到先生的传真——

晴：

你为什么不能进一些更大的电视台？是不是在小台里工作更自由些？当然，前提是必须把本事练好。

周日快得单调，周末过得无聊。上周末有一个party，我说好去的，但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兴致，就调头开回来了。

理想和现实之间

渐渐发现，我的想法并非都能贯彻。

电视台实行三级审片，依次交刘老师、频道总监和台长审。

第一次遭到退货是因为一栏时装节目，我写的解说词有“性感”两字，“性感”是禁语。刘老师说：“这是你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改了交给总监，他在审片单上批示“2'14"处有暴露镜头，请删除。”拿回来一看，只不过是件网眼上装，暴露了什么实在看